

◆ 百年考古大发现

*Rediscovery of the Goddess
——Niuheliang Site*

重现女神

——牛河梁遗址

吕学明
朱 达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百年考古大发现

重现女神

——牛河梁遗址

Rediscovery of the Goddess
——*Niuheliang Site*

吕学明
朱 达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现女神:牛河梁遗址 / 吕学明, 朱达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1

(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

ISBN 978-7-80504-923-6

I. 重… II. ①吕…②朱… III. 新石器时代
—祭祀遗址—辽宁省—普及读物 IV. K87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890 号

重现女神——牛河梁遗址

吕学明 朱达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张 10.125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80504-923-6

定 价: 45.00 元

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只有几个人、十多人，到现在已经拥有数以万计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从1928年以前，中国考古附属于地质学、生物学的科研机构，到现在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独立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在全国十几所国家重点大学设置了考古专业；目前我国的各种文物考古专业性刊物和出版机构，已多达数十家；上个世纪初，我国没有中国科学家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项目，20世纪前半叶全国每年的考古项目也是寥寥无几，当前的考古工作规模绝非昔日可比，为了在大规模生产建设中，搞好文物保护，近年来仅每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就逾千项；至于为科学研究或文物考古教学工作而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也是为数可观。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见于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考古新发现报道接连不断。

2001年初，我国考古学界为了总结20世纪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展示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自豪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全国性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评委和通讯评委来自8个国家级考古文物机构，28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考古文物机构，以及11个大学的考古文博院系。多数评委、通讯评委担任过或正担任着国家级、省级和大学考古文博院系的考物的科研机构或教学科研机构的各级领导职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我国考古文物学科的业务中坚。因此，这次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项目的学术性、科学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评选出来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涵盖了25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发现7项，新石器时代

30项，夏商周时代23项，秦汉时代24项，隋唐至元明时代16项。

本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线的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其中不少人现在已是相关项目方面的专家，有的作者至今仍然承担、主持着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肩负着繁重的田野考古或考古文物科研任务，我知道不少作者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接受这个任务，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挤时间完成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的。

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强调丛书的“图文并茂”是非常必要的。具有丰富而高标准的线图、图版，是考古文物书刊的特点，这是考古文物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考古文物内容的通俗读物，对于线图和图版的要求内容又更丰富一些、形式又更生动一些、线图又更简洁一些、图版也更清晰一些，这样使读者结合文字更容易看懂、读懂，使我们的丛书更有吸引力，使广大读者对丛书产生更大乐趣。考古文物专业的学术术语比较艰深冷僻，作者尽量多使用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词语，但是在这种专业通俗读物中完全不使用专业用语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现在奉献给社会的这套丛书，“文茂”更进步一些、更通俗一些，大家更满意一些。

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弘扬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考古工作者的时代重任，这套丛书也是考古工作者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科研成果。

刘庆柱



引子

——中华文明从这里起步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1961年来东北参观访问时，曾经慨叹道：这些民族一个个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有些则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简单的记录……

令人兴奋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发现居住在这里的原始先民们的文化别具异彩。特别是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灼灼英华，有力地证明了辽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1986年7月24日，中国的新闻界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重大的考古新闻：“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五千年前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出土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中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纷纷来辽西考古发掘工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察，他们兴奋地称这里是“五千年前的神秘王国”。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距今约五千年，正是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历史所经历的一个激烈振荡与整合时期，在世界其他几个文明中心，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文字已经出现，青铜工具已经使用，国家已经形成。正如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所说的那样：“在人所创造出的一切事物中，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就其对历史的影响、给历史打上的烙印而言能够同国家相比。早期人类就已经通过国家为尔后在技术上和文明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早期人类又通过它，在一个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的环境中为自己建立起了秩序、获得了安全。然而还是由于它，人遭受了极为巨大的苦难。这种情况，肯定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对这样一项具有如此明显的两重性的‘发明’进行一番追根寻源的探索了。”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也正是中国考古学者们不懈努力、孜孜



探索的问题。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的发现，为解开这些谜团提供了一把关键性的钥匙。

由巨大的金字塔式建筑、结构复杂的女神庙建筑和庞大的积石冢建筑群所组成的宏大壮观的建筑群址，如果没有一套健全的政权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玉器群；数量众多、器形高大奇特、彩绘纹饰丰富神秘的陶器群；造型巨大、形象逼真而神化、雕塑艺术高超的神像群，令人信服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技术工匠队伍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积石冢墓葬的形制、规模和随葬品之间的差异，明显可以看出等级的差别与分化。积石冢绝不是普通人的墓葬，而是那些掌握神权、政权的特权阶层的墓葬，特权阶层也已分化，神权与政权已经结合，甚至出现一人独尊的现象。牛河梁遗址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礼仪祭祀中心，这些都反映了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

学术界突破传统将牛河梁的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联系在一起，有依据女神庙的黄土塑像联想到女媧氏“抟黄土作人”的故事；有人将牛河梁发达的宗教遗迹推定为颛顼帝的“绝地天通”；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更指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

总之，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文明之源，并从这里走向成熟。

看到牛河梁的三环圆坛，我们会联想到北京的天坛；登上牛河梁的“金字塔”临风远眺，就会想到历代帝王登泰山封禅；抚摩牛河梁的玉器，就会想到“玉有五德”，“君子比德于玉”；看到庄严的神庙，就会想到历朝历代礼繁而隆重的祭祖大典；看到陶器上彩绘的循环涡纹和玉器上以阴阳线条雕琢的涡纹，以及雌雄玉鳖，就会想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当看到红山玉龙之时，你肯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是龙的传人”。

牛河梁遗址和出土文物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和哲学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延续如此之长久，直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影，牛河梁遗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源。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解读红山文化·····	1
第二章 红山文化的圣地——牛河梁·····	28
第三章 石头创造的奇迹·····	37
第四章 重现女神·····	76
第五章 祭地与敬天·····	91
第六章 辉煌的红山文化玉器·····	105
第七章 龙的传人·····	134
参考文献·····	147
后记·····	154



第一章 解读红山文化

可以说红山文化的发现、早期的发掘以及后来的命名、深入研究、突破性进展是与中国考古学的萌芽、诞生、繁荣发展、辉煌成就相辅相成的，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

一 走近红山

1 发现与命名

与考古学在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相应的是，我国最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都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6年至1908年，日本第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与其妻鸟居君子把考古活动扩大到蒙古草原地区，考察了喀喇沁旗、赤峰、林西、达赉诺尔、多伦淖尔、外蒙古和张家口等广大地区，发现了红山后等史前遗存。桑志华是最早在中国从事地质和古生物学以及史前考古的外国学者之一，1922年他邀请了国际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德日进来中国与他合作调查和研究。他们在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区采集到不少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的遗物，仅在当时的热河省就发现了22处新石器地点，也曾到赤峰市东北郊的红山前作过调查。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内蒙古东南部的林西县和英金河流域调查过这类遗存。

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有一座红色花岗岩的大石山，通体透红，挺拔神秀，虽不甚高（海拔746米），但临河突兀而起，怪石峥嵘，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赤峰即由此山而得名（图1）。老哈河支流英金河从南到西绕山而过。红山的山前和山后都分布



图1 赤峰红山

有古代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集中分布在红山山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对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38年发表了考古报告书。这次发掘和发表的材料丰富、全面，包括一批打制、磨制石器和细石器，还有较完整和可复原的彩陶器、夹砂灰陶器等，成为以后多年认识、判断这类遗存的主要依据和标准。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掘，在赤峰地区发现了明确的可与中原仰韶彩陶对比的史前文化，对于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这次发掘也成为日后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之源。

但实际上日本学者对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并不是对红山文化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21年应聘来华进行矿



产资源调查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辽宁省锦西市(现葫芦岛市)南票镇一带进行煤矿调查,顺便搜集地质学、考古学方面的资料。6月10日到达锦西不久即发现了沙锅屯洞穴,6月14日之前,安氏因忙于煤田的调查无暇及此。6月14日当他知道在洞穴中出土了石环、骨锥及大量的人骨之后,他才决定亲手发掘。他邀来当时任协和医学院解剖系教授的布达生共同发掘该洞穴,全部的发掘工作持续到7月中旬才结束。1923年安特生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主办的《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发掘报告。沙锅屯洞穴在山坡南部,海拔216米,洞口方向为南偏西35度。洞的规模不大,洞口宽1.8米,高1.5米,进深约5米。洞顶为较整齐的圆弧状顶,洞底稍低于洞外地表。据发掘报告,洞内堆积可分为5层,出土遗物主要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石刀、细石器、石环、石兽形饰、骨锥、古针、饰压印之字纹和绳纹的夹砂灰陶筒形罐、彩陶折腹盖盆、红陶双耳壶等。洞内还发掘出代表42个个体的人骨。报告推测这个洞穴非古人居住地,而是一处祭祀址。近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作了重新调查,发现这处洞穴遗址位于远离河川的山坡高地,确非古人居住之所。同时在沙锅屯以西三十余公里处的喀左县境内,发现一处时代和文化内涵均与沙锅屯相同的洞穴遗址。洞穴位置在接近峰顶的陡直山坡上,较沙锅屯洞穴所处位置更高,也更为险要。出土遗物与沙锅屯遗址相同,且也出有多具完整人骨。据此推断,沙锅屯洞穴遗址应以墓葬为主,兼具祭祀遗址性质,所出遗物主要属新石器时代的小河沿文化时期,也有属于红山文化的遗物。所以,沙锅屯洞穴应是最早发掘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据考证,安特生是在发掘完沙锅屯洞穴遗址之后转而南下,于同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发掘了著名的河南省浞池县仰韶村遗址。因此,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开始的话,那么沙锅屯洞穴遗址就成为中国近代田野考古中第一个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意义非凡,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考古学者在早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研究以及后来红山文化的命名、广泛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和深入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老一辈考古学家梁思永、裴文中、尹达对分布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彩陶与之字形篦纹陶共存,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具有中原与北方双重文化因素的这类文化遗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20世纪30



年代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梁思永已注意到把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带研究的重要性;裴文中于40年代提出,沙锅屯、红山后的遗存是中原彩陶文化与北方细石器文化在长城地带相遇产生的一种“混合文化”,并设想了长城以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由北向南移动的路线;50年代初,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根据正在病中的梁思永的意见,对这类文化遗存单列一章作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提出这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文化,即仰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相互影响而在长城地带产生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文化,并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认为这一文化对研究长城南北新石器文化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中国考古学界对这一文化的重视,新中国考古工作刚一起步,就开始了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深入的调查、发掘和研究。195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吕遵谔带领下调查并发掘红山后遗址,在进一步明确这一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于1958年在《考古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考古调查报告,使用了“红山文化”这一称谓。1963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发掘了赤峰市蜘蛛山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汉初四种文化的堆积层,明确了这四种文化的相对年代。同年还发掘了西水泉遗址,发现红山文化房址三座。1974年夏,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和敖汉旗文化馆共同发掘了敖汉旗四棱山红山文化陶窑。至此,考古学者对红山文化的面貌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多认为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独立发展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与邻近地区,主要是中原地区关系密切,受仰韶文化影响很大。

2 突破性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出现了重大转折,产生了质的飞跃。有五项工作对推动红山文化的研究作用最巨。

大规模文物普查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辽宁全省开展文物大普查时期,这次普查在凌源、喀左、建昌、建平、朝阳、阜新、彰武、康平等地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上百处,内蒙古敖



汉旗发现四百余处，东山嘴、牛河梁两处重要遗址都是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这次文物普查极大地拓展了红山文化的分布空间。

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

红山文化玉器早有发现和著录，但时代一般定在商周或更晚。70年代以来，辽宁西部的朝阳、阜新两市和相邻的内蒙古赤峰市不断发现这类玉器，引起考古工作者极大关注。专家学者运用器物形态比较的方法同时结合出土线索，大胆推断这批玉器的时代并非商周，而是属于更早的红山文化。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考订是红山文化得到更深层次再认识的开始。

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掘

这是辽宁省境内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发掘，收获出人意料。发现大型石砌建筑址，出土一批特异型陶器、陶塑人像、玉器。显然，东山嘴遗址非居住址，这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址，陶塑裸女像更是“考古界等了三十多年的重大发现”。从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到东山嘴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红山文化内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牛河梁积石冢女神庙的发掘

考古学者苦苦追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在牛河梁重现天日。墓上积石为冢，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而又规则有制，随葬品以玉器为主，堪称中国史前墓制一绝。女神庙则为人们展现出一个神的世界。精妙的布局，高超的建筑技术，华美的装饰，无愧为史前建筑的典范。神形各异的众多人物塑像，丰富的动物造型，显示出这里是众神的殿堂。冢庙结合，庙为中心，这是更高层次的祭祖礼仪和礼的升华。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

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将全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区系类型学说一提出，立刻在学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很快推向全国考古界。这一理论是有效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把钥匙。1983年7月，以“燕山南北地区考古”为题的考古座谈会在朝阳召开。苏秉琦先生在会上高度评价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我国文明缔造史上的特



殊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他建议在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处多做工作。就在会后不久的1983年10月，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被发现并确认，更重要的女神庙也接踵被发现，次年积石冢随葬玉器也正式发掘出土。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以及对红山文化更深层次的认识不是偶然的，这是文物考古工作迅速发展的结果，是考古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结果，更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必然结果。

3 红山文化的基本面貌

6 目前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已基本明确：其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东界越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发现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相遇的现象，这里可视为红山文化分布的西界。从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和文化特征的典型程度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和典型，这两河流域应是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图2）。红山文化因至今缺少文化堆积较厚的遗址发掘和成批陶器资料，分期尚在探索中。据陶器比较分析，早期多红顶碗一类，接近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晚期出有接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另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晚期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据此推定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在距今6000~5000年间。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对红山文化的认识限于石器、陶器、骨器、房址、陶窑等史前文化的一般内容而并不特别引人注意，那么由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由于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而新增加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石砌建筑群址、积石冢群、女神庙、神像群、随葬玉器群，则为同时期中国诸史前文化所不见或罕见，却多是世界各地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

之字纹筒形罐、加工精良的石器、精湛的治玉工艺是古老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绚丽华美的彩陶和精致乌亮的黑陶是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与融合；显赫的山陵群、礼天祈地的祭坛、祭祀祖先的神庙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肇始。红山文化令人刮目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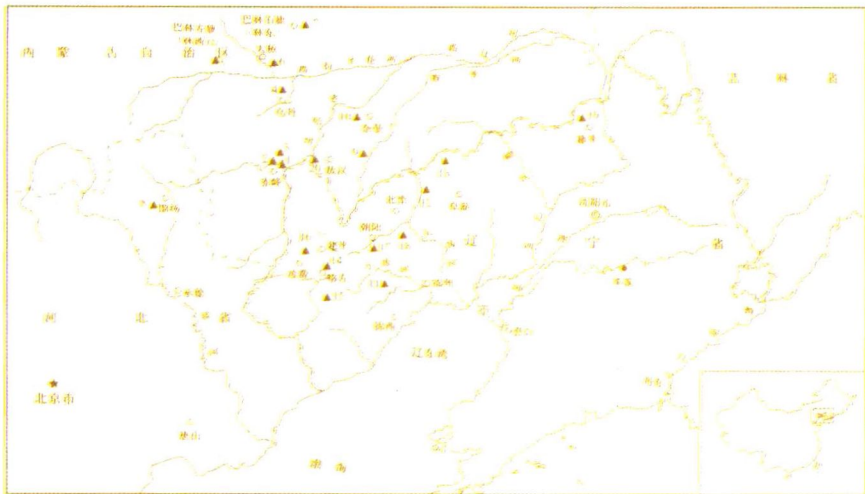


图2 重要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图

1. 赤峰红山后 2. 赤峰蜘蛛山 3. 赤峰西水泉 4. 翁牛特旗三星他位 5. 林西沙窝子 6. 巴林右旗那斯台 7. 巴林左旗城郊 8. 围场下伙房 9. 敖汉下洼 10. 奈曼旗 11. 锦西沙锅屯 12. 阜新胡头沟 13. 阜新福兴地 14. 喀左东山嘴 15. 喀左新营子 16. 牛河梁 17. 朝阳十二台营 18. 北票白石水库 19. 康平城郊 20. 小河沿

我们终于拂开红山文化神秘的面纱，揭示出其丰富、深邃的内涵，红山文化正呈现异军突起之势，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热点和前沿。

二 解读红山人的生活

1 这方水土这方人

乐土乐土

人类是不幸的，当他带着原始的风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第四纪大冰期便与之相伴而来。苦难、磨炼、困惑、考验、搏斗、抗争，充满着原始先民的全部生活。由于冰期时代的生活环境非常严酷，因此，他们必须在与其它物种共处的生存范围内占据自己的位置，取得绝对的优势。这一切，迫使他们凭借大脑和双手去制造工具和武器，凭借语言和记忆去组织战斗的集体。其结果不仅促进了人类体质的生物学转变，而且加速了人类文化的进步。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人类学会了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来抵御严寒，在第四纪大冰期的最后一次冰期极盛时期，曾发生大幅度的



海面下降。距今15000年前后的海平面与现代相比，大约下降了150~160米。大约距今15000~12000年期间，蒙古人种的狩猎者穿过白令陆桥，通过加拿大的冰河走廊，来到了北美洲中部的大草原。距今10930年之前，狩猎者已经跨过了中美陆桥，进入了美洲南部的草原世界。大概与此同时，狩猎者也通过巽他陆桥进入了澳大利亚草原。至此，除了南极洲之外，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因此，第四纪大冰期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苦难，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古猿向人的转变，完成了人猿之间的最后揖别，为人类的繁荣发展聚集的智慧和能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地质历史发展到距今约一万年前后，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全新世。气候转暖导致全球环境巨大变迁，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恰如其分，以气候变暖为推动力的环境变迁，为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奇迹创建带来了福音。在这春光明媚的大好时期，人类尽情地释放了积累的全部潜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

显而易见，全新世的到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创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和条件。正如索尔所指出的：“这个时期是先进的和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类的大好时机之一：纬度较高的地区给人类以移殖的余地。在温和环境里，富饶的河谷使人类大有可为。这个时期对于人类谋求傍水为生，特别是在淡水沿岸生活来说，尤其是一个难得的有利时期。”

大自然是慷慨的，她赐予人类几千年温暖湿润的大好时光，从逆境中走出来的人类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勤劳勇敢、团结协作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使自己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拨开历史的烟云，我们会发现古老的文明在时间的演进上具有大体的同步性，都在距今6000~4000年间进入了大繁荣大发展期，相继进入文明时代。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的自然环境，促使人类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前率先兴起，进入城邦时代。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100年诞生。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问世。

我国东北地区从距今10500~10300年间开始进入全新世，随着气候迅速变暖，人类也大踏步跨入了新石器时代。他们更多地使用磨制的方法制造出精美的石器；他们



不再单纯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而是开始了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作为食物的来源,他们从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他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农业革命。从全国不同地区古环境研究证明,大约距今8000~3000年是气候最佳期,当时气候温和湿润,气候带北移。

根据考古孢粉学和古动植物学研究材料,可以认为红山文化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气候最适宜的时期。当时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原始景观基模以沙地疏林草原为主,包括众多的丘陵、低山、台地、平原、林地、草原、草甸、湖泊等,广泛分布着暖温性夏绿阔叶林,地下水丰富,而且水位高,温暖偏湿的自然环境为先民们的生活繁衍和文化的创造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景观边缘结构显著,具有食物链长、生物“金字塔”基宽的特点,早期人类在此可耕可牧,宜渔宜猎。当时的先民既采摘果实(如胡桃楸)、猎取动物(如鹿、獐)、捕捉鱼类,也种植作物、饲养动物。此时全国各地的古文化蓬勃发展,空前繁荣。东北有红山文化,黄河中游有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有河姆渡——良渚文化,长江中游有大溪——屈家岭文化,各古文化竞相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苏秉琦先生曾用“满天星斗”来形容这一文明景观。各古文化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这其中红山文化既能继承与发扬传统,又能敞开胸怀吸收先进因素,从而在中华文化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

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辽河流域的古文化在我国史前史(考古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产生的年代较早,而且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稳定持续地发展,并且保持较高的发展程度。可以说辽河流域有几十万年的人类足迹,近万年的文明起步,在缔造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曾先走一步。

距今约二十六万年的营口金牛山人是同时期古人类中体质上最进步的代表者,已经懂得用火,并且学会了保存火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骨制鱼镖和骨针、玉器,并且还发现了用贝壳、兽牙、小砾石制成的装饰品,表明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力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加工小型石器,尤其是以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是一大特色,这一文化特征从旧石器一直延续到新石器,并得到了继续发